

【解牛集】 - 刊於<信報>，2010年9月14日

## 香港「試點功能」優勢有增無減

李家濤

香港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講座教授

國家主席胡錦濤上周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30 周年慶典，強調「經濟特區不僅應該繼續辦下去，而且應該辦得更好。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經濟特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發揮作用」，無疑為深圳深化改革作出了政策性的肯定，也為香港和深圳未來的經濟合作，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目前，港深合作的前瞻性目標，是如何實現進一步的「經濟融合」。筆者在前周分析，港深經濟合作的戰略問題（註一），提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深港兩地在同一個「市場經濟範式」下運行，經過了三十年發展，兩地經濟體制的歧異和分界線愈來愈模糊，甚至可以說已很難作出分別。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表示，港深合作發展至今，容易走的路已經走了，未來進一步的合作需雙方在體制、機制、甚至思維模式上創新，這個判斷符合兩地未來合作的取向。

### 前海河套兩大項目備受矚目

照最新的發展情況看，深港未來合作的焦點，在於前海和河套兩大項目。中國國務院上月 26 日已作出批覆，原則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並明確把前海建成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引領帶動中國現代服務業發展升級。按照規劃，前海位於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的核心，面積 15 平方公里，日後可於 10 分鐘內抵達深港兩地機場，半小時內抵達香港中環，從空間上看，可謂與香港「連成一體」。

至於河套的項目，早於八十年代中期，當香港製造業「北移」時，便有人提出在港深邊境區設立「邊境加工區」的建議。事實上，在邊境建工業區，無疑有助吸引若干香港企業到該區投資，再利用 CEPA 協議，把區內的產品以零關稅進攻內地市場。可以說，利用港深邊境的大幅用地，是香港進一步發展的合理選擇。港深兩地政府較早前簽署了合作意向書，同意將佔地約 0.87 平方公里的落馬洲河套區，初步用作高等教育用途，配合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而前海則定位為高端服務業，主攻金融。討論至此，我們已清楚看到，港深兩地經濟進一

步合作的「兩大項目」。

## 前海發展六大產業

近年，澳門將發展空間著眼到珠海的橫琴島；而香港把發展空間擴展到深圳，也相當順理成章，都是希望藉此擴大市場的範圍。據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副主任許重光日前透露，未來三年，深圳市將向前海合作區投入400億元，重點發展創新金融、現代物流、總部經濟、科技及專業服務、通訊及媒體服務、商業服務等六大產業。

由於香港固有優勢仍立足於金融服務業，因此，我們如何把握今天的新形勢，強化本身優勢的核心競爭力，的確十分重要；而企業家如何發揮經濟學家 Kirzner 所稱的「前瞻性機敏」(Forward alertness)，這富創造性的「企業家精神」，把未來變局所帶來的利益「現值化」(註二)，如今亦可謂處於一個相當關鍵時刻。

## 深港金融創新服務區的機遇

據此，我們不妨從粵港合作的框架，更細緻地檢視香港可利用的形勢和條件。最近廣東省政府發佈了五份促進珠三角一體化的規劃檔，為粵港金融合作定出一系列新思維和目標，其中清楚提到，將深圳前海及河套地區，建設成為「深港金融創新服務區」，以開展資本市場改革創新綜合試點；亦明確表示探討粵港合作開拓商品期貨市場，創新粵港深三地人民幣業務的可行性，並降低港資金融機構進入廣東門檻等。可以看到，粵方冀加快珠三角與香港金融業深度對接，戰略目標相當明確。

對香港來說，利用固有的金融業優勢，從中擴展市場，當然機不可失。其中所得的業務機遇可謂多種多樣，包括為深圳高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由於合作尚在規劃藍圖中，究竟「深港金融創新服務區」兩地的金融「分工」，包括前台服務和後台服務如何，必須有一個清楚的架構，否則便很難發揮「分工」所達致的互利和規模經濟效果，這也是合作的一個重要前提。

## 深化金融改革需要「試點實驗」

但無論如何，隨著港深兩地的經濟融合，資本市場所發揮的效力益發增大，加上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得到中央支持，使國家以至企業來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數量有增無減；企業透過香港的股票市場籌集資金發展，必然使證券市場積聚更大的發展動力，也為深港的股票交易市場提供合作的條件。

目前，中國證券市場雖然在市值上有相當規模，但市場的「不成熟」也非常顯著，包括上市交易法規並不完善、市場結構失衡、缺乏對沖性的衍生金融工具，使得市場運作出現非理性的波動。企業上市的市盈率動輒超過五十倍，首次公開招股上市首天收市的抑價率，高達 80%。因此，港深兩地的證券市場加強合作，借鑒香港較為成熟和國際化的市場經驗，建立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之間形成套利機制，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顯然提供一定的好處。另一方面，深港資本市場合作，亦可拓寬了香港人民幣的投資管道，有利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快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步伐。這個趨勢，隨著深港進一步合作而逐步成熟。

事實上，國家深化金融改革，包括開放資本帳戶，把人民幣國際化，已成為「離弦之箭」，目標和方向非常清晰。因為只有深化金融改革，確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互補和協調，中國經濟才有持續發展的根本力量。人民幣離岸發展，讓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透過「試點」來「摸著石頭過河」，幾乎成為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來的「指導方針」；這個改革戰略方針，隨著俄羅斯採取躍進式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 失敗，而顯得更有「說服力」。

## 中國走向政治體制改革之路

對於粵港深的經濟合作，有人擔心，香港會淪為內地其中一個「城市」，逐步喪失有別於內地城市的優勢。當然，這種想法不能說完全是「杞人憂天」，但如果香港洞悉、並充份利用「一國兩制」的框架、不斷鞏固本身的核心優勢，香港對中國改革的「試點功能」和「優勢」，是任何內地城市所難以取代的。

在深圳舉行經濟特區成立三十周年典禮前夕，總理溫家寶「南下」深圳，並提到中國改革的進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這番透露，成為境內外傳媒關注的焦點。從發展廣義的角度看，政治體制改革是大勢所趨。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中國三十年來的變局，在 1978 年底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開放改革方針，突破計劃經濟教條，主要是出於「政治考慮」，試圖扭轉大躍進、十年文革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以至民生動盪危機，是透過經濟改革來穩定政治和社會，故此可以說，中國最初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根本戰略是為「政治服務」。

## 香港「試點功能」難以取代

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個「人為設計」的改革戰略，在實踐市場經濟過程中，卻出現了「非人為設計」的結果。如果我們用海耶克 (F.A.Hayek) 的政治經濟學範式分析(註三)，實踐市場經濟體制——包括必須確立私有產權、清晰界定「競爭」的手段和規則等，自然而然地衍生了這個制度一些「自發秩序」，由於競爭的規則和費用不僅制約了人的行為，也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制度取捨的選擇，從

而使決定競爭規則和確保私有產權的制度安排參與權利——政治參與訴求及行為逐步醞釀和展現。反過來看，政治體制改革也成為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進一步「保證」。

照目前發展情況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由「經濟改革支持政治」，逐步發展至「政治改革支持市場深化發展」的階段。而香港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過程，同樣可以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試點」，藉以觀察民主化過程中的社會管治和變遷。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對中國大陸改革的「試點」功能，無論在經濟金融或政治上，在可見將來也不會消失，甚至隨著香港的有效發展而有增無減，成為香港在中國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價值」所在，這一點實在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也許這也是中央同意加強港深在前海及河套合作發展，以及溫家寶總理在經濟特區建立三十周年慶典前夕，專程南下深圳，並談到深化改革，包括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等連串事件所給予我們的啟示和戰略考慮。

註一：李家濤，〈港深前海經濟合作的戰略和啟示〉，刊《信報財經新聞》，2010年8月31日

註二：Israel M.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3

註三：F.A. Hayek, “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Desig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